

方法论视域中的康德与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

——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系列研究之四

谢 群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来重构形而上学的体系, 为知识划定界限。维特根斯坦则站在康德的肩膀上, 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批判语言, 重构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说,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理论是在康德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产生的。本文比较研究康德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思想, 剖析后者在方法论上对前者的继承与批判, 旨在展现二者语言哲学思想之间不可忽视的联系,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方法论; 维特根斯坦; 语言批判; 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2)06-0025-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Kant and Wittgenste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Xie Qu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Kant reconstructed the metaphysics through critique of reason, and aimed to limit the knowledge of human. Wittgenstein inherited his method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metaphysics by critique of language from the logical analysis. In this sense, Wittgenstein's Critique of Language is the inheritance of K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is paper contrasts thoughts of earlier Wittgenstein's with Kant's, and tries to analyze his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ver Kant in methodology, and endeavor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to other researchers.

Key words: methodology; Wittgenstein; critique of langua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 引言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一生提出两种不同的哲学,被看作当代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并使他的传奇经历有了可供谈论的思想背景。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指出“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Critique of language)”(Wittgenstein 1958: 24)。他将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归于我们对语言逻辑的误解,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昭示人们,哲学的方法是没有定式的。

简单地说,语言批判就是对语言的反思与追问。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这个术语首先出现在德国哲学家毛特纳(F. Mauthner)的《语言批判论稿》一书中。维特根斯

坦在采用它时加上了引号,旨在突出他与毛特纳的不同。然而,恰恰是在批判毛特纳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批判”理论。弗雷格和罗素则在各自研究语言逻辑的方法上启迪了维特根斯坦。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已经开始对语言的逻辑研究,并尝试使语言在逻辑上完善起来。舒炜光认为,“如果说维特根斯坦自己在‘语言批判’中添加了什么东西,那就是:他把‘为思维划一界限’问题,即寻求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之间的区别问题,当作是‘语言批判’的核心问题”(舒炜光 1982: 206)。但是,这种为语言划界的思想似乎与康德对待人类理性(Vernunft)的方法有些相似。本文的目的就是展现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理论的渊源,为更好地研究“语言批判”理论奠定基础。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思想研究”(12YJC74011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维特根斯坦选集》文本研究”(12YJC740063)以及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商务英语‘话语共同体’理论建构”(QW201025)的阶段性成果。

1770年,康德(I. Kant)在他的教授求职论文《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中提出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他不仅否定具有独断色彩的唯理论,而且用自己的体系代替怀疑主义的经验论,从而开创自己哲学发展的批判时期。此后,康德抛弃了自己坚持的莱布尼兹-沃尔夫形而上学唯理论的立场,同时质疑休谟(D. Hume)的怀疑主义经验论。他从全新的角度对以往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实施综合,提出先验主义的批判哲学。作为批判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以《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引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批判狂潮,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正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弄潮儿。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来重构形而上学的体系,为知识划定界限。维特根斯坦则站在康德的肩膀上,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批判语言,重构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critique of language)理论是在康德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产生的。

康德认为自己处于一个批判时代,包括纯粹理性在内的一切都应该受到批判。他所说的批判并不是指对于理论和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于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指对于理性寻求独立于所有经验的一切知识的批判。在他所处的年代,由于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哲学开始渐渐失去了统治科学的地位。在康德看来,这是在对人类的理性提出诉求,是令他从事理性的一切事业中最艰巨的事业(理性自知之明)的动力。他希望“不以独断的命令而依据理性自身的永恒不变法则而组织一所法庭,以保证理性的合法主张而消除一切无根据的僭妄主张。这种法庭就是《纯粹理性批判》”(舒炜光 1982: 209)。于是,纯粹理性既是批判的对象,又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试图通过纯粹理性自身的批判性考察来达到纯粹理性的自我反思,即最终完成纯粹理性的完整体系。从这个角度看,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从事的“语言批判”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相似之处。

此外,西方学术界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流派归属问题是有争议的。芬兰哲学家斯蒂纽斯(E. Stenius)在分析《逻辑哲学论》时反对把维特根斯坦看成分析哲学家,主张把他列为康德派哲学家,并且以大量篇幅予以论证。鉴于康德写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他就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改称为《纯粹语言批判》,似乎书名在语言形式上的相似也有助于证明维特根斯坦的康德派身份(舒炜光 1982: 208-209)。

“语言批判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点。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是一座宏伟的桥梁,那么‘语言批判’就是它的拱心石,通过它,我们可以托起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个理论大厦。如果说《哲学研究》是一首完美的交响乐,那么‘语言批判’就是它的主旋律,通过它,我们能够更好地欣赏并理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华彩乐章。”(谢群

2009: 26)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以语言批判为切入点,探究康德与维特根斯坦在方法论上的渊源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两者的语言哲学思想。

2 图型说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卷第一章提出“图型”(Schema)^①概念。他认为,“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到一个概念之下来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和这个概念是同质的”(康德 2004: 138)。在康德看来,一个对象应该包含在一个概念之下。而属于纯粹知性(Verstand)范畴的概念和感性的(sinnlich)直观(Anschauung)是完全不同质的,在任何直观中都不可能找到它们。为了指出纯粹知性概念具有能一般地应用于现象(Erscheinung)之上的可能,他试图建立一门判断力的先验(transzendental)学说。既然概念与直观之间没有任何共性,那么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这个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但却一方面是知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种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型。”(康德 2004: 139)

2.1 图型说理论

康德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图型说”这一概念。他认为范畴是先天的,来自于知性,经验的东西来自于后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知识。因此,必须通过一个中介才能将范畴运用于经验对象。同时,知识既有感性的内容又有知性的形式,知性的部分来源于主体,但是感性的内容来自于物自体(Ding an sich)^②对于人们感官的刺激。这种不可预知的刺激具有偶然性,它的来源和主体的结构不同。那么来源截然不同的知识成分如何结合在一起呢?康德认为,需要一个中介——图型。它在具有知性能动特点的同时,又是感性的。

康德突破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限制,不再简单地把感性经验和理性能力对立起来。他另辟蹊径,确立了感性经验与理性能力之间的知性过程,并把人类的知性能力解释为“一切纯粹概念发展的线索”,是得到一切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而在这个知性过程中,“图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西方哲学家的一般理解,“图型”就是用来组织、描述和解释我们经验的概念网络和命题网络(江怡 2004: 39)。

“‘图型’这个词是一个希腊词,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型的、有形象的,它是直观的,但这个图不是那种直接由五官感觉到的那种图,而是一种形式化的抽象化的图。”(邓晓芒 2005: 35)康德以狗的概念为例,认为“我们的想象力可以根据它来普遍地描画出一个4足动物的形状,而不局限于经验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任何一个惟一特殊的形状,也不局限于我能具体地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可能的形

象”(康德 2004: 140 - 141)。也就是说,当我们用“狗”的概念去看具体的狗的时候,预先在心中要形成一个狗的图型:一个抽象的四足动物的形象。但具体的狗长什么样,比如体态的大小、皮毛的颜色等,我们还不知道,只是设想这个四足动物大致的抽象形象。显然,康德认为我们在用概念把握具体对象的时候首先要形成图型。例如,贝克莱(G. Berkeley)曾经有这样的疑问,谁见过这样一个三角形,它既不是钝角也不是直角、锐角?确实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三角形,所以贝克莱断言一个抽象的“三角形”的概念不存在。康德却利用“图型”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抽象的“三角形”的概念在现实的直观中无法显现,但它可以作为现实的感性直观跟“三角形”的概念相互结合起来的一个中介、一个图型而存在。可见,虽然“三角形”的概念是抽象的,但我们头脑中可以呈现出一个笼统的三角形形象。它既不是锐角,也不是直角或钝角,但我想它有3个角。这就形成了使我们能够把“三角形”的概念运用到具体的直角、钝角或锐角的三角形中去的一个中介,也就是三角型的图型。

实际上,我们的纯粹感性概念的基础并不是对象的形象,而是图型(康德 2004: 140)。也就是说,图型是人的感性概念的基础,是人认识感性对象的中介。兼有知性与感性特点的图型能够如实反应现实的、直观的根本特点,所以能使人形成知性的概念。康德创造性地提出的这个“第三者”的理论,巧妙地解决了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之间毫无共性的问题,也同时给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picture theory)提供了理论框架。

2.2 批判与继承

诺德曼(A. Nordmann)指出,维特根斯坦在1916年后系统拜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Nordmann 2005: 19),希望以此来证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即使维特根斯坦没有直接阅读过康德的著作也不能说明他们思想之间毫无联系。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语言与世界存在逻辑同构性。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图像论”,即:(1)命题是实在的图像;(2)图像是一种事实;(3)图像与实在之间、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4)在图像与实在之间、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共同的结构。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用的“图像”既不是临摹式的图画,也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图像”,而是某种抽象的如同地图般的内在结构。每个具体的事实的图像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图像与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却是恒定的,也就是命题与事实之间有着共同的逻辑形式。“命题借助于逻辑的脚手架来构成世界。”(维特根斯坦 1980: 40)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说:

2.022 显然,一个想象的世界,无论它怎样不同于实在的世界,必有某种东西——一种形式——为它与实在

的世界所共有。

2.16 事实要成为图像,它和被图示者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

2.18 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为了能够一般地以某种方式正确或错误地图示实在而必须和实在共有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

(Wittgenstein 2003: 35, 41)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事物是世界的最小组成单位。它按一定的方式组成原子事实,而原子事实(atomic fact)又构成事实。同时,事态分为存在的事态与不存在的事态。存在的事态是事实,而世界是存在的事态,即事实的总和。与此相应,名称是语言的最小单位,它以有意义的方式组合成基本命题;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所有命题的总和是语言。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与世界是极其对称的,二者具有影射关系:名称与对象相对应,基本命题与原子事实相对应,作为命题总和的语言与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相对应。也就是说,“语言与世界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只有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才能最终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刘辉 2010: 26)。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这种逻辑同构关系也就是图像关系。

显然,维特根斯坦与康德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康德认为图型兼有知性和感性的特点,是人认识世界的桥梁。而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只能通过语言去认识世界。由此可见,双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引入第三者作为中介,不同之处则体现为第三者性质的差异。康德的图型兼有概念与对象的特点,而维特根斯坦的图像是一种事实;康德的图型与对象同构,维特根斯坦的图像与事实同构。他们之间的相同显然是“战略上”的一致,是本质上的符合。而两者之间的不同则是“战术上”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差异。但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在康德的高度上停滞不前。相反,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对应同构的理论。康德并没有论证图型自身是否具有先验的自明性。维特根斯坦却反思了逻辑形式本身。他指出:

4.121 命题不能表述逻辑形式:后者反映于命题之中。

自行反映在语言中的东西,语言不能表述。

语言中表达了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命题显示实在的逻辑形式。

命题展示出这种逻辑形式。

6.13 逻辑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世界的一个映像。

逻辑是先验的。

(Wittgenstein 2003: 79, 169)

维特根斯坦具有比康德更为深刻的批判意识。在对逻辑形式的追问中,推动了新逻辑——数理逻辑的发展,如逻辑真值表的发明以及他对罗素逻辑原子主义的影响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他深刻的批判性。

3 不可言说

康德通过批判人类特有的理性区分了可知的现象和不可知的物自体。与此相应,维特根斯坦通过批判人类特有的语言区分了可说与不可说。这种思路上的一致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3.1 关于不可言说

欧洲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在18世纪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其中,休谟(D. Hume)的彻底怀疑论将经验论推向极致。他通过解构因果关系的手段瓦解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是休谟并不否认客观规律,并且自称“实在论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认为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看到的我就不说,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康德和休谟有相同之处,休谟就说我们只说我们知道的事情,不知道的不说。康德认为,我们在知识里面发现有这样一个体系,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我们通过反思追溯了这些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原因,我们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邓晓芒 2005: 33)

休谟的彻底怀疑论向整个西方提出挑战,使西方的全部科学知识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康德曾坦率地承认,“正是大卫·休谟的提醒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论的迷梦,并且给予我在思辨哲学领域的研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康德 2005: 261)。他巧妙运用“对象符合知识”的方法挽救了哲学和科学,为信仰保留了领地。康德认为,近代以来唯理的独断论和经验的怀疑论之所以长期纠缠不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对象区分为可知的现象和不可知的物自体。例如,对于对象,人类能否先天地有所知,能否得到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事物是可知还是不可知等。康德这种“人为自然立法”的区分被视为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简单地讲,康德把客观世界分成可认识的“现象”界和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他认为“物自体”是不能被感觉、被表象的,即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和表象。与作为经验对象的“现象”不同,“物自体”既是超验的,又是先验的,是我们无法经验的东西。康德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自在之物可能是什么,我并不知道,而且这也不需要知道,因为一物除了在现象中外,毕竟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在我面前”(康德 2004: 247)。鉴于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所以对这部分要“保持沉默”。但是,有学者认为把世界分为可知的“现象”和不可知的“物自体”,是一个不可知论的危险倾向(古雷加 1993: 58)。有学者据此认为维特根斯坦关于不可言说的部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体现。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二者之间的联系。

3.2 批判与继承

“维特根斯坦不想消极地否定语言或取消语言。与此相应,在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之间划一界限才成为他的

‘语言批判’的核心问题。在这里,他的批判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划界限的问题。”(舒炜光 1982: 210) 维特根斯坦认为:

5.4711 给出命题的本质,意味着给出一切描述的本质,也即给出世界的本质。

5.6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5.61 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

我们不能思考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

5.62 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我所唯一理解的语言的)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5.634 与此有联系的一点是,我们的经验中也没有一部分同时是先天的。

(Wittgenstein 2003: 127, 148, 150)

在他看来,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由于语言与世界具有逻辑同构关系,语言才可以描述世界。但语言只能描述世界中的事实,而不能描述界限之外的领域,所以还存在一些需要通过我们的意志和感觉来向我们昭示的领域——不可说的东西。因此,维特根斯坦说:

4.01 命题是实在的图像。

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

4.021 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因为当我理解一个命题,我就知道它所表述的情况,而且无须向我解释其意义,我就理解这个命题。

(Wittgenstein 2003: 63, 67)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对“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的划分既是对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划分,也是对理性和悟性两种认知方式的划分。只不过维特根斯坦用“显现”代替了“悟性”。他认为不可说的东西显现自己,这就是神秘的东西。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显现”是超出科学语言的一种表现超验世界的一个手段。它包括两种途径:(1)语言的解释功能;(2)突破语言的障壁,超越语言的逻辑局限,以非理性语言的方式直接表现世界。这种划分就是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矛盾升级为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冲突。在此,维特根斯坦思想深处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心态也初露端倪。

尽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康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笔者认为还是不能简单地将他归入康德派的哲学家之列。维特根斯坦在反对康德的同时借鉴了康德。尽管他的划界方法与康德对知识采取的方法类似,但是两者也存在明显不同。康德虽然批判理性,却没有明确表示要为思想划定界限,也不认为现象和物自体有可思与不可思的区别。他指出物自体是可思的,但不是可知的,也不是认识的对象。在康德看来,理性的界限就是知识的界限,即可知与不可知的界限,而不是可思与不可思

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使科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成为可能。与康德不同,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要为思想划定界限。他说,“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6: 49)。而这个界限只能在思想的表达式——语言中来划定,即只是从语言批判的角度而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考察思想及其限度。因此,“语言批判”理论是通过可对说与不可说的区分来限定可思与不可思。这种划界的结果就是对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

4 结束语

作为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哲学家,康德通过解决休谟难题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现代哲学。他开创了批判哲学,启迪人们的批判意识,并且通过论证人的有限性,为人类追求全称命题的美梦敲响警钟。在追求永恒和永真的哲学探索中,他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他在对人类自身理性的不断拷问中寻找哲学的出路。他认为,只有为纯粹理性划定界限,才能使信仰成为可能。维特根斯坦继承了康德的这种划界思想,认为应该为人类的思想划定界限。但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无法为思想,也就是人类的逻辑划界。如果能为逻辑划界,那就说明我们可以非逻辑地思考。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含蓄地指出康德的不足,更进一步将理性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转化为语言——伴随着人类始终的一个伙伴。更准确地说,他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界限。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清楚地区分了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认为对于不可言说的部分我们就应该保持沉默,而对于可言说的部分我们就应该把它说清楚。这也是肯定人的有限性的表现。在区分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后,任务就是如何将可言说的说清楚。康德运用图型说将人类头脑中知性的概念与现实世界中感性的物自体对应起来。但是这两者却没有任何共性,需要图型这个第三者来连接。维特根斯坦借用了这个引入第三者的方法,用图像论将逻辑与世界对应起来。他认为逻辑与世界同构,而这又都在语言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只要能清楚分析语言,就能认清我们的世界、我们的逻辑。由此可见,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框架与康德十分相似,这主要归结于前者对后者在方法上的继承。

牛顿说过,“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维特根斯坦也不例外。“通过对语言的反思,维特根斯坦既找到了一个判断意义的标准,又创造了一种澄清哲学困惑的方法。”(刘辉 2009: 23) 如果没

有前人的成果,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们也就无法了解他的哲学观。本文对康德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剖析后者在方法论上对前者的继承与批判,以期展现哲学家思想之间不可忽视的联系,为在更加广阔的视域中研究语言哲学提供理据。

注释

- ①对于 Schema 的翻译有很多种,比如“图像”、“图式”和“图型”等,本文统一采用“图型”的译法。
②Ding an sich 的中文译法很多,本文统一译为“物自体”。

参考文献

- 邓晓芒. 康德哲学讲演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古雷加. 德国古典哲学新论[M]. 沈真 侯鸿勋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江怡. 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J]. 哲学研究, 2004(6).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 第四卷[M]. 李秋零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J]. 外语学刊, 2008(6).
刘辉. 索绪尔与后期维特根斯坦: 继承与超越[J]. 外语学刊, 2009(3).
刘辉. 本体论视域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J]. 外语学刊, 2010(6).
舒炜光. 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82.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郭英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谢群. 语言批判: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点[J]. 外语学刊, 2009(5).
Nordmann, A.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M]. G. E. M. Anscombe translat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Inc., 1958.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 C. K. Ogden translate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Publishing Inc., 2003.